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社会质量视角下的社会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1ASH001

社会质量、社会建设与幸福感

徐延辉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社会质量视角下的社会建设研究”

项目编号11ASH001

社会质量、社会建设 与幸福感

徐延辉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质量、社会建设与幸福感/徐延辉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615-6791-3

I. ①社… II. ①徐… III. ①社会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D6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08078 号

出 版 人 郑文礼
责任编辑 文慧云
封面设计 夏 林
技术编辑 朱 楷

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政编码 361008
总 编 办 0592-2182177 0592-2181406(传真)
营销中心 0592-2184458 0592-2181365
网 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 箱 xmup@xmupress.com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16.25
字数 305 千字
插页 1
印数 1~1000 册
版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信二维码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博二维码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社会建设及其当代内涵	1
第一节 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	2
第二节 社会建设与幸福感	24
第二章 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	42
第一节 社会质量理论及其应用研究	42
第二节 社区能力与社会建设	58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68
第三章 社会质量及其本土化研究	71
第一节 社会质量的比较研究	71
第二节 社会质量指标体系研究	84
第三节 社会质量与社区创新研究	97
第四节 社会质量与创新意识研究	114
第四章 社会质量与居民幸福感	124
第一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124
第二节 社会经济保障与幸福感	128
第三节 社会凝聚与幸福感	136
第四节 社会包容与幸福感	146
第五节 社会赋权与幸福感	153
第六节 社会质量对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161



第五章 社区能力与居民幸福感.....	175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75
第二节 社区能力对幸福感的影响.....	177
第三节 社区能力、政府绩效与幸福感	183
第四节 社区能力、社区效能感与幸福感	193
第六章 国外社会建设经验:启示与借鉴	203
第一节 瑞典社会建设经验.....	203
第二节 美国社会建设经验.....	212
第三节 英国“社区复兴运动”经验.....	218
参考文献.....	228
后 记.....	255



第一章

导论:社会建设及其当代内涵

虽然社会建设的思想源远流长,但是社会建设作为一个施政纲领只在近几年才被我国政府列入国家发展战略之中,因此本书所探讨的社会建设即为当代社会建设,使用的理论视角主要是源于欧洲的社会质量理论和社区能力理论,其中社会质量理论是主线,社区能力理论是辅线。本书的目标是利用这两条线索来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应该包含的主要内容,并对社会建设的路径和提升居民幸福感提出对策和建议。

研究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经过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与经济急剧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会发展滞后。社会阶层分化严重,社会凝聚力下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失调的现象引起学界和政界的广泛关注,人们开始对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社会发展的模式进行反思,逐步认识到增长并不等同于发展:发展事关人民及其福祉,涉及他们营造其生活的能力。同样,发展必须考虑今后几代人和他们将承继的这个地球。发展必须有人民的参与,否则,没有什么战略能获得长期成功。将发展作为福祉这种观念意味着对发展的衡量不仅要看其增长率,还要考虑发展的弥散面、构成要素及其可持续性。GDP(国内生产总值)至上的发展观导致我们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建设,其结果不仅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而且为社会可持续发展埋下巨大的隐患,中国的发展已经步入到需要加强社会重建才能再造经济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时代(孙立平, 2009)。由此,社会建设及幸福感问题进入人们的视野。什么样的发展能为人们带来更大的幸福?

从社会学角度看,对幸福感的考察不能脱离社会的整体发展来思考,这是社会公众幸福感的社会基础和源泉。而源于欧洲的社会质量理论为研究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模式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念和研究范式,也为系统地讨论人



们的幸福感问题提供了一个新视角。社会质量理论倡导要追求确保人的尊严,使公民享有一定公民权,具有民主、平等和社会团结机制的社会。这种导向与追求 GDP 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同;相对而言,它更关注一个社会的社会经济保障程度、社会融合程度、社会包容程度和公民对于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程度。因此运用社会质量理论来考察社会建设的目标和建设的内容,在理论上更前沿,在实践上也更具有操作性。本书即是在大规模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利用社会质量理论,考察社会质量对于人们的幸福感的影响,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第一节 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

社会建设概念自古有之,本研究把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社会建设称之为当代社会建设。本书研究的主要问题是社会建设和幸福感,研究的视角是社会质量理论,即利用社会质量理论及其相关指标探讨如何进行社会建设和提升人们的幸福感。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因此本章首先介绍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相关概念,然后分析社会建设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社会质量作为研究视角留在下一章进行讨论。

一、何谓社会建设

(一)社会建设思想的由来

社会建设概念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历史上就有丰富的社会建设理论,见诸《周礼》、《礼记》及儒家和法家思想等(夏学銮,2007)。在民国时期社会建设有了广泛的研究,特别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之后。最早提出社会建设这一概念的是孙中山。孙中山在民国六年即 1917 年,曾为《建国方略》之三《民权初步·社会建设》一书作序。在这篇序中,孙中山强调要把四万万一盘散沙的民众团结起来,行使民权。为此,民众应从学习集会开始,因为“会议通则为教我国人民行使民权第一步之方法也,倘此第一步能进,行之能稳,则逐步前进,民本之发达必有登峰造极之一日”(孙中山,2006:414)。如果说孙中山先生更多的是从政治家的角度研究社会建设,那么一些社会学者则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社会建设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研究。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学界关于社会建设在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方面均有一定的成果。在理论层面,社会学家孙本文曾对社会建设问题进行了相对系统的理论思考,并将社会建设定义为:“依社会环境的需要与人民的愿望而从事的各种社会事业,谓之社会建设。”

(孙本文,1935:244)在实证研究方面,陶孟和、李景汉、杨开道等社会学家开展了各种社会调查,为社会建设研究奠定了实证研究的基础(杨雅彬,2010:73-75)。

20世纪40年代,在战后民族复兴和现代化发展的双重压力之下,中国社会学界在社会建设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模仿西方的现代化,农村和劳工问题受到忽视,社会问题重生,因此带有民主政治色彩的社会建设开始向社会领域转变,乡村建设得到重视。受到民族危机的影响,社会建设也从乡村改造转向国家民族复兴的整体追求。而相对集中的、较大规模的社会建设研究出现在1944年《社会建设》月刊创办之后。20世纪40年代社会建设研究发展了之前提出的社会建设思想,并在社会建设的目标、建设内容和基本建设架构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构想,为当时的工业现代化提供了合理的借鉴(宣朝庆、王铂辉,2009)。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从改造社会的实际出发,不断探索社会建设经验,尤其是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明确把社会建设作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严书翰,2011),社会建设被正式提上议程。

(二)当代社会建设研究

社会建设作为一个产生于本土情境的概念,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发展变迁及发展理念的转变。随着学者对社会建设的关注越来越多,社会建设的意涵也越来越丰富。综合而言,目前关于社会建设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社会资源、机会配置论”。这一观点认为社会建设的内涵主要是以“社会资源和涉及机会合理配置”为核心,可以从正向和逆向两方面来把握社会建设。从正向说,所谓社会建设,就是要在社会领域不断建立和完善各种能够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并相应地形成各种良性调节社会关系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从逆向说,社会建设就是根据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新表现、新特点和新趋势,不断创造和完善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新机制、新实体和新主体;通过这样的新机制、新实体和新主体,更好地弥合分歧,化解矛盾,控制冲突,降低风险,增加安全,增进团结,改善民生(郑杭生,2011)。

二是“社会结构论”。这一观点认为,社会建设就是为适应国家由农业农村的传统社会向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社会的转变,适应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积极面对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有组



织、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的各种有利于改善民生,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进步的社会行动与过程(陆学艺,2011)。

三是“民生论”。“民生论”观点主要以民生作为社会建设的导向,重点发展社会事业,强调社会建设的社会是相对于政治、经济而言的社会。民生为主的社会,强调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关注住房、养老、收入再分配、就业、计生、教育等关乎国计民生的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建设是有限定的(李强,2010)。

四是“社会管理论”。“社会管理论”认为当前社会建设应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只有加强社会建设和创新社会管理,才能为社会建设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有序的社会秩序。社会管理论认为,应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提高社会管理的科学水平。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逐步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通过政府主导、多方参与,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认同,秉持社会公正、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治安,应对社会风险,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既有活力又有秩序的基础条件和社会环境,最终目标是促进社会和谐(陆学艺,2011)。

五是“社会主体论”。该观点认为社会建设应该培育社会的主体,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元结构,充分发展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培育公民社会。通过社会主体的培育,弥补政府和市场的失灵,为政府和市场的有效运作提供良好的社会基础。现代社会日益分化为三个既相互关联又彼此独立的领域,即政府组织、企业组织和社会组织。但当前中国三个领域联动的社会结构和整合机制还没有很好地形成。因此,如何正确处理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统一起来,是当前需要重点解决的新问题(李培林,2007)。

以上对社会建设内涵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只是强调不同学者在界定社会建设含义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各个概念的界定也可能出现重叠交叉。社会建设含义的侧重点不同,相关学者关于社会建设的研究视角、社会建设包含的内容、社会建设的载体和社会建设手段也必不相同。

(三)社会建设研究的社会学视角

纵观中西方社会发展历程,我们发现社会建设是各国政府在现代化不断向前推进中的必然选择。由于西方社会较早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因此,有关西方社会建设的理论也较为成熟和系统。同时,在我国社会建设的实践场域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社会建设经验。因此,本书主要从西方社会建设理论和马

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两个视角来探讨社会建设。

西方社会理论并没有关于社会建设的直接提法,但是在经济学、政治学,尤其是社会学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建设思想,诸如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市场转型理论、冲突理论/整合理论、社会福利理论等(应星,2005;李培林、苏国勋等,2005)。如果按照库恩的“范式”来划分的话,西方社会建设理论可分为社会事实范式、社会行为范式、社会释义范式和社会批判范式(周晓虹,2009);如果按现代性发展的程度来划分,又可分为包括科学主义、解释主义和批判主义的现代性社会建设理论和后现代社会建设理论(刘少杰、王建民,2006)。发端于现代性的西方社会建设理论,内含着对秩序和进步的追求,对我国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其自身也存在特殊性。因此,我们应该探索出一条既能与世界现代化的常规道路接轨,又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建设的中国道路(周晓虹,2012)。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建设是以“完整的人”(个人、群体和人类)为出发点,以生产力、实践活动、政治解放为条件实现人的解放(袁琳,2011)。在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列宁的社会建设思想把革命主题和建设主题、党的领导和群众动员、平等追求和消灭社会差别、保证福利和人的全面发展有机地统一起来,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社会建设的最高目标(张云飞,2011)。

(四) 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

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单向到多维的过程,具体内容经历了从发展“民生与社会事业”,建立“价值规范与社会秩序”,到改革“社会管理方式、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等多个方面。

民生是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基础,社会建设的重点内容应该放在民生和社会事业上。民生问题是社会矛盾多发凸显的基本根源,是个人安全和整体社会安全的连接点。社会建设应该明确民生为重、百姓至上,只有以民生为社会建设的重点才能促进公平正义。在重视基本民生建设的同时,还要特别关注弱势群体,为弱势群体提供公共服务(郑杭生,2012;陈光金,2011;邓伟志,2007)。我们在重视包括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改善住房等民生事业的同时,还应该加强以科研、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在内的社会事业建设,夯实民生事业的基础;应该大力发展社会事业,不断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陆学艺,2011;丁元竹,2010;孙立平,2011)。

除了物质生活的建设之外,价值观的建设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以及人们思想的多元化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构建基本价



价值观及其社会规范开始纳入社会建设研究者思考的范畴。建立大多数人能够认同的价值观,就是既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又要坚持哲学社会科学的深层次理念,比如以人为本的理念、共赢互利的理念、现代治理和善治的理念等(郑杭生,2006)。在价值观多元化的背景下,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以“道德秩序、信用结构和基础制度”为核心,以秩序建设促进社会建设,并将社会秩序建设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推动力(孙立平,2007)。

社会建设离不开社会管理方式的创新。加强社会管理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只有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才能为社会建设创造稳定的社会秩序(丁元竹,2010)。目前我国的社会管理方式比较落后,社会管理的行政化色彩浓厚,在这种传统管理模式的治理之下,社会矛盾越来越多(陈光金,2011)。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必然要求,在全球已经进入风险社会的时代背景下,要形成社会安全体制,社会管理就越发显得必要(陆学艺,2012)。新形势要求社会管理必须在管理的理念、方法、手段、流程、话语等方面进行革新(邓伟志,2007)。同时,社会管理应该以社会权力的实现为导向,以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为前提,更好地实现社会管理(杨雪冬,2010)。社会管理要从片面的、防范性的消极管理走向积极的、全面的社会管理,社会管理要以改善社会状况、建设一个充满幸福感的更好的社会为目标(孙立平,2011)。

长期以来,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导致了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局面。研究表明,当今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是工业化社会的中期阶段,但社会结构还是工业化的初级阶段,社会结构大约滞后经济结构15年(陆学艺,2011)。因此,我们应该调整、优化社会结构(陆学艺,2011;孙立平,2011),特别是加强以社会阶层结构为核心的社会结构的调整和合理化。构建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长效机制是社会建设的重中之重(郑杭生,2006)。社会建设的侧重点是利益关系的协调,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关系,通过政策调整,形成利益关系协调的机制,以理性化和制度化的方式化解矛盾和冲突(孙立平,2007)。利益关系主要通过体制/制度来实现,要想调整利益关系必须加强体制建设,社会体制问题没有解决,就不可能真正有效地解决现阶段诸多的社会问题(秦德君,2011)。我们要通过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形成政府有效调控、市场合理竞争、社会有序治理的局面(李培林,2011)。

开展社会建设离不开社会组织建设,因为推进社会建设事关两项基本内容:一是提供实实在在的公共服务,二是实现有效和谐的社会管理。而这两项内容都涉及社会组织建设(卢汉龙,2010)。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提

供更加全面的公共服务。但是,目前第三部门还没有发挥出自己应有的功能,还不能有效地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没有充分发挥降低社会管理成本的作用。因此,发展民间组织是社会建设的应有之义(郑杭生,2006),这种转变体现的是由政府、市场二元治理格局向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三元治理格局的转变,这种转变要求落实公民权利,增强社会的自我组织能力(孙立平,2011)。李友梅等人认为,“公共性”既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同时又是其支撑性条件之一。近年来的民主制度建设和促进社会组织发育等政策对于“公共性”的生长产生了明显的积极效果。但是,“公共性”依然是当下中国社会建设面临的主要瓶颈。推进公共性,提升不同群体参与社会建设的积极性,对社会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李友梅等,2012)。社会组织,是国家和政府之外的“第三域”,通常也叫“第三部门”,属于狭义的社会领域。社会组织一般既是非政府组织(NGO),同时也是非营利组织(NPO),大体可以分为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三大类(郑杭生、洪大用,2006:11)。社会组织的发育和运行,不仅有利于社会自治和社会创新管理,还能弥补政府工作的欠缺与不足,降低社会建设的行政成本(李瑞英,2012)。同时,社会组织因其自身的非营利性、民间性、志愿性和灵活性,成为协调社会结构各层面关系及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整合手段(任慧颖,2007)。为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有必要建立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制度化模式,通过探索培育社会组织的机制,梳理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志愿者队伍和社区建设的关系,构建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在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加强对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监管等方面进行创新,以更好地推动社会建设(高红,2011;尹志刚,2010;张丽霞、张利平,2011)。

(五)社会建设的载体与手段

对社会建设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宏观的理论层面上,更应该着眼于社会建设的载体和手段上。本研究主要从社区建设和社会政策能力建设探讨社会建设。

社区建设主要从空间和功能两个维度推进社会建设(李璐、冯宏良,2008)。社区建设是中国社会建设的新起点,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和谐社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微观的社区建设是宏观的社会构建的切入点。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就是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社区服务、社区就业、社区保障、社区学院等充分体现了民生“五有”的内容。社区与社会在结构上具有一定的同构性,社区制度是社会结构的制度化形式,是缩小了的社会制度。因



此,经由社区发展实现社会进步,是一条既能达到宏观社会发展目标,又不损害微观团结基础的现代社会发展之路。伴随着社会快速转型,社区成为各种利益关系的交汇点、各种社会问题的聚集地,人们逐步认识到社会建设必须以社区建设为基础,和谐社区建设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李雪萍、陈伟东,2008)。社区建设是建立国家、市场以及公民社会结合在一起的新型社会关系的理想方式,是实现社会整合和社会团结、重建人文精神、重建道德方案和实现以人为本发展战略的基础,是消除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平等、实现社会稳定的最有效的手段(潘泽泉,2010)。

社会建设手段有多种,但社会政策是其最主要的手段之一。社会政策通常是指政府为了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增进社会福利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其核心是预防和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的生活风险。进行社会建设,首先必须从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着手。以社会政策为引领,可以提高社会建设的自觉性和科学性(岳经纶,2011)。社会政策核心理念是公平正义,从根本上讲,基于公正理念的社会政策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具有内在的契合性乃至一致性。因此,应该加快与社会建设相配套的社会政策建设(李迎生,2007)。在社会建设过程中,政府要加强社会政策能力建设,切实使社会政策发挥应有的作用(王思斌,2004)。社会政策产生于西方现代化进程当中,北欧国家的经验表明,社会政策是推进社会建设的有效工具,也是对人们日常生活进行民主化改造的手段;借鉴北欧经验,我们应在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强调建立社会理想,培育公共精神,促进个人利益与公共精神相结合(林卡、张佳华,2011)。

社会工作也是社会建设的重要手段。中国正在经历快速的经济社会转型,在转型过程中社会问题的复杂化为社会工作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专业的社会工作将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王思斌、阮曾媛琪,2009)。新时期社会工作与当前社会建设的中心任务具有契合之处,社会工作价值理念的介入、服务价值的介入和专业方法的介入,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和问题、促进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完善社会管理和服务,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纪德尚、陈冬仿,2008)。虽然社会工作有助于解决社会问题,但是,只有在文化背景与价值认同、政府投入和制度支持、问题导向与需求导向等方面得到有效发展的情况下,社会工作才能真正在社会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沈晖,2010)。

二、社会发展及其研究进展

“社会建设”是我国特有的学术和政界术语,西方国家与此最为接近的术

语是“社会发展”。思考社会建设,当以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理念及其路径为鉴,因为西方国家一直走在现代化前列,在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理论研究及实践探索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尽管西方社会发展的理论和经验不能照搬到中国,但对其社会发展的理念及评价体系进行梳理,对我国的社会建设理念及路径选择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社会发展的含义

社会发展是当今社会的一个重要议题,西方学者对于社会发展及评价模式已有很多讨论。对于社会发展的内涵,可以将其分成广义和狭义两种。

从广义上来讲,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类似,指发展中国家向现代化国家发展演进的路径。这个层面的社会发展,源于古希腊哲学,原指有机体的自然演化过程。二战之后,社会发展现代性雏形显现,吸引了很多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普遍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发展,GDP成为衡量发展水平的唯一指标。到20世纪70年代左右,以佩鲁、托达罗等学者为代表,开始提出除了经济发展,还要关注社会的其他方面。托达罗认为,应该把发展看作是“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除了收入和产品的提高之外,发展显然还包括制度、社会和管理结构的基本变化以及人的态度,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还有人们习惯和信仰的基本变化”(托达罗,1992:50)。20世纪80年代,随着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问题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倡导人、自然与环境和谐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受到追捧。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的发展观备受青睐。

狭义的社会发展主要关注个人、家庭或社区的发展。工业化进程中产生了经济发展理论所无法解释和处理的社会矛盾,社会学家呼吁要复兴社区建设,强化社区功能以解决危机和矛盾。社区发展就在社区复兴、社区重建的理念基础之上被提出。20世纪初,社区发展重点在社区的住房、就业、学校和培训中心等基础设施的建设。20世纪后期,社区发展形式逐渐组织化、制度化,重点强调居民自强自立精神的培育,以人为本促进社区的全面进步和发展(何彪、吴晓萍,2002;李玉华,2009)。比如20世纪50年代初,联合国经济理事会通过的390D号议案中,提出用建立社区福利中心的社区发展方法来推动整体发展的规划。1952年联合国成立社区组织与社会发展小组,1954年改为社会局社会发展组,推动落后地区的社区发展运动。目前,社区发展实践既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也发生在发达国家,同时共存于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社区发展实践目前已经在世界范围内100多个国家进行,由此既形成社区发展运动的潮流,同时极大地催生并促进了社区发展理论的研究(陈涛,1997)。进入



21 世纪,关于社区发展的研究关注非政府组织、第三部分、社会团体等公民社会参与社区建设的情况,强调能力建设的理论导向。

纵观学界对社会发展含义的讨论,关注的实质是如何处理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社区发展三者关系的问题。在目前的发展理论框架下,世界范围内大体产生了三种发展类型:一是片面注重经济发展的观念和实践,二是重视社会发展的理念与实践,三是强调社区发展的理念与实践(陈涛,1997)。广义层面的发展实现了从经济增长向经济发展再到社会发展,最后向综合发展的方向演变,体现了发展视角由最初追求的物质丰富向寻求人的发展的转变,同时也是一个由经济发展向社会发展和社区发展转变的过程。狭义层面的社会发展,强调社区是一个微观实体,许许多多不同类型的社区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社会发展要立足于社区,只有关注社区成员的发展,解决了社区存在的问题,才能通过社区成员发展带动社区发展并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的发展。该理念强调,社区发展既是社会发展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是实现社会发展的工具和手段。尽管上述界定社会发展的角度有宏观与微观之别,但其理念都经历了从关注物的发展向重视人的发展的转变。本书所探讨的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主要采用微观含义,即主要从个人和社区层面探讨如何进行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

(二)社会发展理论研究进展

自社会发展的概念被提出之后,各个领域的学者通过自身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对其进行了不断的修正和完善。

从广义层面来讲,社会发展理论发展可以分成两个阶段:19 世纪 30 年代到 20 世纪 40 年代为第一阶段,主要特点是把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加以研究;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为第二阶段,主要特点是用各种不同的理论解释现实社会发达与不发达、先发展与后发展的现实,以及落后地区如何发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刘敏,1999)。在这两个阶段,依据社会发展理论类型不同呈现为四种理论类型:经典社会发展理论、发展理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理论、社会可持续发展理论。其中,经典社会发展理论主要有结构功能主义、冲突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等,发展理论主要有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理论有需求理论、新的发展观,以人的永续需要为中心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理论。同时,将社会发展理论关注重心的演变归纳为由重物到人、物并重,再到以人的永续需要为中心。

从狭义层面来讲,西方关于社区发展的理论流派众多。早期的社区发展理论以关注贫穷地区和弱势群体为主。20 世纪初期,社区发展主要注重改善

贫困群体的生活条件,关注社区的物质建设较多。20世纪后期,社区发展理论开始关注居民的自强自立精神,强调以人为本、促进社区全面进步和发展。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桑德斯的三种社区模式研究,即社会体系论、社会冲突论和社会场域论。社会体系论将社区作为一个社会体系进行分析,个人、群体、机构之间相互交往、相互作用的网络促进了社区的发展。社会冲突论认为,社区是有利益追求的群体聚合的地方,其中存在的冲突是社会发展中不平等的必然结果,也是促进社区发展的重要动力。社会场域论则认为社区是一个互动的场域,这个场域时刻都处于变动之中,围绕社区居民的需求及解决当地社区问题展开讨论,通过这些讨论促进社区的发展(李玉华,2009)。到了21世纪,社区发展理论开始关注社区和成员的能力建设,强调通过能力建设路径促进社区发展,同时强调非政府组织、第三部门等公民社会参与社区发展。

以上是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框架性介绍。为了追踪当下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最新趋势,同时借鉴吸收其有价值的思想,下文重点介绍利益相关者理论、社会治理理论、公民社会理论等目前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新进展,社区能力理论作为本书研究的辅助视角,将在下一章进行专门介绍。

1. 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在台湾被译成利害关系人理论。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西方的公司治理实践中,后来扩展到社区、政府、环境保护组织等。王身余(2008)认为,利益相关者的角色经历了“利益相关者影响”到“利益相关者参与”再到“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演变。在利益相关者影响阶段,通过分析利益相关者收集信息,观察利益相关者影响,采取提高组织战略可行性和管理有效性的因应措施。在利益相关者参与阶段,利益相关者实施管理参与以提高管理有效性,从组织活动对利益相关者实际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影响(包括冲突)、这种影响可能引起的参与需求以及组织活动特别是组织管理有效性对利益相关者支持的依赖出发,将利益相关者问题纳入组织内部程序,以图“把冲突转化为合作”(杨瑞龙、周业安,2000)。这种参与总是在某种既定主体主导下的参与,充其量只能分享而不能主导、只能触及部分而不能掌控全局(Matten and Crane,2005)。参与总是与对参与主体的资格限制、参与事务的范围限制、参与过程的程序限制等控制或限制相联系,是一种受控和受限的活动。参与式管理的实质,多数时候是“改良式的自主管理决策”。利益相关者



共同治理阶段,相关者分享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实施组织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①

2. 社会治理理论

自从世界银行于1989年使用“治理危机”一词,有关治理的含义及其理论便成为东西方学者关注的焦点。斯托克(1999)指出,治理理论的根源不止一端,包括公共机构经济学、国际关系、组织研究、发展研究、政治科学、公共行政管理以及受福柯的理论启发而来的若干理论。治理(governance)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关于治理的界定,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最有权威和代表性。他们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他人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整理当代治理理论,社会治理蕴含了有限政府、法治政府、公众参与、民主、社会公正等理念,以共同治理为本,谋求政府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公民社会等多种社会管理主体之间进行广泛沟通与交流,通过共同参与、协同解决、公共责任机制,在社会公正的基础上提高社会管理的效率和质量(孙晓莉,2005)。社会治理理论主要观点包括:

(1) 治理主体去中心化,倡导建立多主体、多中心的协同治理机制

政府在合法地使用暴力、决定重大的公共资源的分配方向和维护公民基本权利、实现公平公正等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斯托克认为,“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它对传统的国家和政府权威提出挑战,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斯托克,1999)。里奇等人认为:“治理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其他公共权威,也涉及在公共领域内活动的准公共行动者、自愿部门、社区组织甚至是私营部门”(Leach and Smith,2001)。可见,治理理论倡导多中心的治理机制。多主体、多中心的协同治理机制,是基于信任为基础构建的多元参与的互动治理网络,各个网络成员相对于国家保持其自主性,从而摆脱政府的束缚进而对政府的失范起到其所预期的对政府行为的规范与制衡作用(蔡全胜,2002)。

^① 关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与社区发展研究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在社区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与发挥的功能,请参阅徐延辉、龚紫钰:《城市社区利益相关者:内涵、角色与功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2期。